
2020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中国最高规格的国际论坛之一，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坚持“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自 2011 年以来，万事达卡一直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顶级合作伙伴。2020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于 11 月 11 日-13 日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以下是本届年会精彩观点汇编。

【开幕致辞】

韩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中国“十四五”时期发展作出全面规划。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我们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这决不是搞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推动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欢迎各国企业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欢迎各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贡献。

国际社会需要广泛凝聚共识，积极开展合作，协同战胜疫情，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提出以下倡议：

- 一是加强全球抗疫合作，共同为世界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 二是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以更加开放的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 三是深化全球科技合作，推动科技创新更好造福全人类；
- 四是打造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绿色复苏；
- 五是坚持推动普惠共赢，促进均衡、公平、包容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

【数字经济，是短暂繁荣还是加速转型】

李颖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一级巡视员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要素，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相结合，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刻的数字化变革，以数据生产力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方面。

未来将不存在没有数字化的行业，今后数字经济也将会是实体经济最核心的内容。

发展数字经济是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应对风险挑战的思路之一。

我国正在通过对工业互联网的探索，走入数字经济发展的深水区。

斯蒂芬·罗奇

Stephen S. Roach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提出了要注重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速度、数量型的经济，在过去 30 年投资、出口引领的经济模式当中可能还行得通，但是在未来就有很大的挑战。数字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其世界级的数字化平台转化为自主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强大的数字化平台是通往本土创新之路的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可以参考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对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想象力，焕发出社会内部创新活力，真正加入自主创新的浪潮。中国长期以来都在谈论这个问题，现在就是付出实践最好的机会。

法布里齐奥·霍克希尔德

Fabrizio Hochschild

联合国副秘书长

在疫情恢复过程之中要重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远程教育、医疗服务等数字技术让经济仍然能够运行下去。

在疫情之后，应该让所有人都能够获得数字服务，不能让某些人落在后面，无法与世界连接。已经连接的人群也面临信息和数据安全的问题，以及被虚假信息欺骗和利用的风险，这些也是需要我们重视的。

这呼吁我们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共同规划开放、包容的数字未来。

黎诚恩

Anne Richards

富达国际首席执行官

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小企业带来了新机遇。超级平台提供连接的可能性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些网络连接的广度、深度和易用性创造了机会。数字经济已经是各领域产业都可以享有的权利，比如小企业利用阿里物流在国内外扩大自己的用户群。



监管机构必须快速跟进，更好地管理不同商业模式混合的企业，确保消费者得到公平对待。

丹尼尔·舒尔曼

Daniel Schulman

贝宝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此次全球健康危机及相应而来的经济挑战都极大加速了从实体到数字的转变。我相信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消费者已经养成了新的消费习惯，而企业正在做出回应。我认为这一趋势将是不可逆转。

数字化不会造成所谓的“干扰”。它旨在使消费者和包括小型商家到大型零售商在内的不同规模的商户都能够受益于商品和服务的全球流动。小型企业的数字化将是建设一个更加普惠繁荣世界的关键所在。

【打造韧性金融体系】

肖远企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

全球疫情对金融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长期而深远的。目前做出肯定而准确的结论为时尚早。

全球超常规宽松政策边际效应递减，政策空间受到挤压。

货币政策锚定的均衡利率有了更加复杂的影响机理，而金融资产价格应成为重要的参考因子。

必须在方向性和操作性两个层面加强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国际协调。

必须研究分析疫情对金融运行产生的长期影响，“无接触金融”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孙天琦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

三年金融风险攻坚战重点风险处置项目已达到预期目标。

有效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打通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

商业银行需要前瞻性增加拨备计提，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

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给国内外投资者稳定的越来越好预期。

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主体。

杰弗里·冈本

Geoffrey W.S. Okamot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

2020 年前六月十大央行资产合计增加了 6 万亿美元，是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 2 倍多，现在这个数字达到了约 7.5 万亿美元。

这为全球经济及时止损、为防止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但这些前所未有的措施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金融条件可能会提高金融风险，积累长期脆弱性。

在央行实现其宏观经济目标之前，货币政策应该保持宽松，但当金融条件改善时应该根据需要撤回特殊的流动性支持。

祈耀年

Noel Quinn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

货币政策本身是不够的，需要有其他政策的配套和调整。必须有财政政策为经济纾困，一方面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实现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扶持受疫情影响比例高的企业。

不良贷款在经济危机复苏后可能会拖累经济的发展，削弱银行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通过一些组合管理的方法管理不良贷款是全球金融行业需要在未来几年解决的问题。

米哈伊·鲍陶伊

Mihály Patai

匈牙利国家银行副行长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匈牙利中央银行推出了许多新的举措，我们为银行系统提供了更多的流动性支持，为中小企业提供成长资金计划，并增加了企业债权购买计划。

此外，根据匈牙利中央银行的建议，匈牙利政府对企业和家庭贷款分期付款实行了暂停或者暂缓，匈牙利中央银行也推出了政府证券购买计划，成功稳定了政府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稳定性，降低了收益率。

匈牙利央行是最早强调政府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需要密切合作，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中央银行之一，虽然目前危机管理是第一要务，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长期目标，那就是提高竞争力，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此外，疫情也凸显了数字化和数字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瑞·达欧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董事

目前整个金融体系存在由美元为中心的系统带来的风险。

为规避风险，首先要找到其他的另类的财富持有的手段，其次要推进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化，增加中国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

【后 2020 时代的中美关系】

傅莹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两国社会氛围对彼此都相当负面。但如双方因误判而走向冲突，那将是历史性悲剧。

中美之间即便竞争不可避免，也应是可控的，协调与合作仍应是主导面。两国应努力进入一个稳定“竞合关系”阶段，认真对待和努力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

中方需要关心和解决美国企业提出的合理关切，美方也应该为在美国经营的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的经营环境和保障。

克雷格·艾伦

Craig Allen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中美关系不确定性成为美国在华企业运营的最大挑战，对中国在美运营企业也一样，这会破坏双方企业的信心、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率。

尽管如此，美国企业依然承诺会长期加大对华投资。

特朗普可能还会不断制造噪音，吸引人们的关注。

库尔特·坎贝尔

Kurt M. Campbell

亚洲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美国前助理国务卿

未来中美之间竞争仍会是主旋律。两国需要将竞争维持在稳定状态，实现“稳定竞争”。

短期内拜登政府会更多关注国内事务，但同时会和中国接触。外交方面会加强和亚太、欧洲盟友的对话和多边合作。

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历史上美国一直在影响亚洲，但现在已经不具这样的能力。

中国应该扩大与美国不同利益群体的接触，建立起朋友圈。除了人文交流外，中国也要尝试更加理解美国国内政治的格局。

威廉·科恩

William Cohen

美国科恩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中美间争议本质上是基于一种战略不信任。

拜登政府之下，或将更多关注负责任的外交关系并奉行专业的外交政策。但中美关系走向不会有本质改变，中美在高科技等关键领域的脱钩无法避免。

此外，拜登政府或将继续围绕南海主权、台湾、人权问题和中国进行谈判，这些问题也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中美可在环境保护、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多方面开展合作，其中医疗卫生和疫情防控的合作将是未来中美合作的基础。

对话：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vs. 劳伦斯·萨默斯，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教授

“想象有两个人，坐在一个有两支桨的独木舟里，漂流在离岸很远的湍急海水的漩涡中。他们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和情感关系，但此时此刻，为了生存而合作的迫切性压倒一切——这就是中美两国目前所处的局面。”

中美贸易政策变化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未来十年的 GDP，更重要的问题发生在科技领域。

拜登上台后不会朝令夕改、胡作非为，因为遵守有序的程序是担任公职的必要条件，如果他不能依程序办事，不可能在议会待 36 年。

中美两国一个国家成功，而另一个国家失败的情况是很难想象的。如果两国出现重大冲突，就都会面临非常糟糕的后果。

我们不一定要把对方变成自己的样子，也不是要一方完全剥夺另一方在世界的影响力，更不是要让一方的制度垮台或者崩溃另一方的制度去征服世界。

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纽约时报》外交评论专栏作家

过去四十年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历史高峰期，双方产生了“无意识交融”。这种无意识的交融具有准“一国两制”性质，构筑了全球化进程的基础。

但近年来中国制造升级，中美两国都在销售能够深入对方社会的技术，而双方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因此“深层技术”带来的变革与两国不信任的矛盾导致中美关系日趋紧张。

中美关系是全球化的内在引擎。中美关系的恶化导致了全球化进程的退化。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重塑】

郑国雨
中国银行副行长

疫情影响下，服务贸易已经取代货物贸易成为推动经贸发展的核心力量。未来，服务贸易有望成为“全球化新引擎”。服务贸易可以推动全球化再次加速，具体表现为：

第一，传统服务贸易项目数字化、线上化特征日益突出；

第二，传统服务的可贸易性得到极大拓展；

第三，新技术的应用催生了新的服务贸易业态；

第四，服务外包为更多主体参与全球市场创造了可能。

为此，应积极打造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双轮驱动”格局；加强先进信息技术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应用；加强国际合作，帮扶相对落后国家，挖掘新动能；推动政策协调和国际贸易规则融合。

施伟德
Frederick W. Smith
联邦快递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目前，美国经济复苏在多个领域呈现 K 型。经济链条上端的企业蓬勃发展，而处于低端的公司面临被抛下的风险。

总体上全球制造业和贸易仍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一，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多元化等趋势使短供应链可能会持续发展。

二，疫情加速了消费者偏好转变和数字转型，电子商务呈暴发式增长。

三，绝大多数美国小企业主仍然广泛支持全球贸易，将其视为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开拓新市场的机会。

孟立国
Florent Menegaux
米其林集团首席执行官

全球合作是重塑全球化的首要步骤。

全球性企业可以在重塑全球化过程当中扮演重要角色。跨国集团由于其人才、资源、遍布全球的业务等优势，天然具有塑造全球化的能力。

全球性公司需要履行一个使命，即成为转变、行动和进步的代言人和代表。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面对逆全球化问题，要直面四个问题：

第一，目前逆全球化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在加速。

第二，新冠疫情对于目前全球化的形势是具有两面性的。即使在疫情完全消失之后，全球化并不能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全面恢复。

第三，过去一百多年来，人类经历过四次逆全球化，解决的方式实际上都不是软着陆，而是激烈的碰撞。

第四，我们已经给疫情之后的全球化治理开出很多药方，但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成为问题本身。

为此，他建议：修复全球化第一步需要国际合作共同抗疫；应重视经济复苏政策的全球协调性；寻找符合各国利益的结构性的解决方案；加强国际治理体系的修复。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如果各国都能确保国内不再在全球化下产生更多‘净输家’，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世界就可以期待经济全球化恢复活力并持续下去。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未能弥补本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输家”，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兴起。

对进出口货物和服务实行双向征税可以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

鼓励在国际交易中使用本国货币，是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方式。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通信和交通互联互通，有助于深化经济全球化，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

【世界经济复苏：如何从 K 型走向 V 型】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全球经济复苏分化加剧；债务水平攀升，风险隐患增大；供应链进一步萎缩，向更内向、更分散的方向发展；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K 型复苏”特征将加剧社会不平等矛盾。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强有力的国际合作，携手应对新冠疫情和全球治理挑战，从而推动全球经济重返稳定复苏轨道。应当充分利用多边平台，加强政策对话，积极寻求最大公约数，推动绿色复苏，加快数字化转型，消除“数字鸿沟”，使数字化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引擎。

劳伦斯·芬克

Laurence D. Fink

贝莱德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后疫情时代退休危机值得关注。应尽力避免劳动者因缺乏足够的储蓄而不能退休。

气候风险就是投资风险。向 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转型会成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长期可持续性问题的可帮助各国在未来吸引全球投资。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疫情期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货币扩张战略，致使全球流动性长期泛滥，引发超低利率和负利率陷阱。

为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我们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逐渐恢复活力。

苏世民

Stephen A. Schwarzman

黑石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共同创办人

我们相信从接下来的 12—18 个月开始，全球经济会加速复苏。第二波疫情将会放缓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复苏，但是人均 GDP 不会降得更低，因为会有一系列的刺激性财政措施，抵消放缓的影响。

我相信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与疫情复苏直接相关，也和更有效的对话和合作相关。中国和美国尤其应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预计美国新政府将会调整外交政策的基调，这将有益于中美关系。

杰森·福尔曼

Jason Furman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

当前全球对危机的应对措施只能说具有相关性（correlated），而不具协调性（coordinated），因为各国持有不同的利益和立场。

中美两国非常关键，需要努力领导全球的协调应对，尤其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

狄澜

Dilhan Pillay Sandrasegara

淡马锡国际首席执行官

我们非常依赖多边化的机制进行投资。

可持续性发展和气候问题将成为未来业务的核心。

绿色金融对促进可持续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绿色债券、绿色技术、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将能更好的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变局中的技术创新与合作】

刘烈宏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工信部近年在坚持技术创新和开放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一是以大项目大工程为抓手，推动企业间合作创新。二是瞄准行业竞争技术，打造开放、协同、高效的创新平台。三是提升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的能力水平，构建良好创新生态。四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技术创新环境全面优化。

当前，中国正在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好创新与合作这两个关键点，从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二是强化技术创新的支撑能力。三是优化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四是深化技术创新国际合作。

欢迎和支持更多企业来中国发展，参与到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与合作中。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精神、更加务实的作风，营造更加公平宽容的创新环境。

史蒂夫·莫伦科夫
Steven Mollenkopf
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

今年，数字鸿沟所导致的网络连接差异性正不断突显，而 5G 将会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5G 将惠及各个区域的家庭、企业、机构。它可以以经济高效的方式，为学校、医院和市政厅等机构提供光纤般的无线连接速度，解决农村教育“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5G 的未来发展也同样振奋人心。最近的研究表明，到 2025 年，中国的网络连接预计将占全球的 30%。此项研究估计，2020 年 5G 商用将直接为中国创造 54 万个工作岗位，2030 年该数字将增长到 800 万以上。

罗卓克
Chuck Robbins
思科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网络技术的本质是创新，但是创新还不够。充分挖掘互联世界的好处，还需要合作和相互信任。如果没有合作关系，是无法将两种技术联结在一起的。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繁荣的关键将取决于创新和合作这两个要素。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市场。中国过去 70 年间历史性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打造持久广泛的伙伴关系的机会。仅在过去十年，我们就从中国本地公司采购了超过 250 亿美元的产品。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向其发展目标迈进，中国市场将继续创造出重大的、令人心动的机遇。

凯 飒
Joe Kaeser
西门子股份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全球不断推进，合作与协同将成为必由之路。对此我有两点建议。

第一，我们需要加大数字化的研发投入，以行业转型为目标，而不是局限于个别有限的系统或者技术。

第二，建议中国加强与跨国企业的合作，特别是要加强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合作，它们贡献了中国 50%的外贸额和 20%的税收。在即将到来的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中，以及在打造全球数字产业平台的创新生态体系过程中，它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双赢合作和协同创新的伙伴。

康林松

Ola Källenius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

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电气化和智能网联等领域。“十四五”期间，中国在 5G、人工智能、充电设施等新基建领域的投入，将为产业转型和技术变革持续注入新的动力。

同时，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道路，尤其是要坚定实施已经公布的汽车行业开放路线图，不仅至关重要，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公平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也是中国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此外，保持创新体系的开放，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在智能网联汽车标准法规制定和协调等相关议题方面继续深化国际合作。

汉斯-保罗·博克纳

Hans-Paul Bürkner

波士顿咨询全球主席

要启动双循环，需要中国企业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关注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同时强调创新。

目前，中国已经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方面实现领先。更重要的是，要使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来促进各种行业、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使得各个价值链实现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发展，并获得更强大的韧性。

【绿色复苏：全球新共识？】

解振华

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正部长级）

习近平主席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的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体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和力度。

中国的实践证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培育带动新的产业和市场，实现协同发展。

尼古拉斯·斯特恩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我们目前面临的两个未提及：疫情危机和气候危机，都需要全球合作才能解决。现在需要打造新的全球化结构。

不能再犯 2008 年金融危机时的错误，尤其是欧洲。

劳动密集型行业对经济复苏非常重要，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复苏，而这种可持续经济复苏将是未来转变的第一步。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要重视绿色核算的问题。目前缺少一个统一的量纲。我的团队发展了一种名为生态源的核算体系，对生态资本服务价值进行初始核算，同时对污染带来的影响进行减值，最后对生态源本身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来定价。

绿色转型从本质上讲是要用一套新的绿色技术来替换原有的不那么绿色的技术。中国现在绿色发展的重点是城镇化，特别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推广绿色技术。

乐明瀚

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

最近欧洲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第一是气候变化，第二是疫情，第三是失业。

希望美国未来更多加入到全球合作当中。